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散文

第一章

16
世纪前

1.1 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和社会问题促成英语散文的丰富多彩

16
世纪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英国 19 世纪前三十余年的政治改革措施和立法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上层建筑，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适应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之后六十余年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世界性的殖民扩张和文化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7
世纪



●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这一时期，英国的铁路交通发达，生铁、煤炭产量和外贸额巨大，开采能源的机器开足马力，北部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至中部工业中心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物浦等工业和海港城市崛起。英国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迅速成为“世界的工厂”。在海外，英国凭借其海上霸权和大国威力进一步殖民东方，占领缅甸，称王印度，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此外，英国还南下埃及和南非，向大洋洲和北美洲扩张势力。到 19 世纪末，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面积已是其本土的一百余倍，跨越欧亚非大陆，成为“日不落帝国”。在此期间，英语也随着大英帝国的统治和殖民扩张走向世界，奠定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1851 年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的“水晶宫”国际工业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革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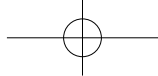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18
世纪



● 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

19
世纪

20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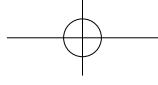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 维多利亚时代的曼彻斯特

来的世界性成果，炫耀了大英帝国的辉煌。虽然1848年欧洲各国大都发生了社会动荡，爆发了大革命，但因为英国保守派势力强大，加之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故而得以隔岸观火，保证君主立宪制度不变色，也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洋溢着乐观进取精神也进一步促进了科学和文化的发展。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经过长达5年的海外航行、实地采集标本和分类研究，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提出自然进化论。这部著作以唯物主义的实证方法，通过对各种动植物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对生物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做出了唯物的、客观的解释。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撼动了上帝创世的观念，动摇了几千年基督教文化的基石。自然进化、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的学说，进一步强化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科学传统，再次激活了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进步观念和乐观精神，客观上鼓励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此外，电报、电灯和电话的相继问世，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注重审美品味，建筑和绘画风格多样，继承和创新交替。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文学创作受到盛世生活的影响，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这也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绝

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的英国，人们生活相对富足且人心受教化，上流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风靡一时，绅士彬彬有礼，淑女热衷下午茶文化。这个时期的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在其诗作《皮帕之歌》（“Pippa’s Song”）中让天真烂漫的青年女工唱出了歌颂美好生活的名句：“上帝高居天堂乐园，世间一派祥和景象。”（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这样的诗句表达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举国洋溢的乐观精神。

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也一并产生，例如：贫富差别扩大、阶级矛盾激化。这些社会问题都促成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资本主义无序竞争加剧，经济危机频发。无休止的机械“进步”和对金钱、利润的追逐，导致社会道德衰败、犯罪率上升和文化缺失。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大规模的煤矿开采和大机器生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沿海地区往来穿梭的运煤船在蓝色的海岸划出一道道黑影。绿色的原野上铁轨纵横，蒸汽机车的烟尘一路飞散，给传统的农耕文化抹上一层灰暗的色调。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工业大城市，高耸的烟囱日夜吐出黑色的烟尘，笼罩住一排排低矮昏暗的工棚，一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这部小说里描绘的那样：“机器喧嚣、烟囱林立的城镇，高高的烟囱冒出黑烟，蜿



蜒如蛇，永远前行，永不消散。”工业化进程和急剧的社会变化，让这个时代众多文化批评家和思想家们心中充满挥之不去的现代焦虑，从而促成了文化反思和批评的展开。

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发出多元的文化以及诸多的社会问题，却也为这个时期英语散文的多元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个机械、现金和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社会里，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表现欲望增强，自由主义思想蔓延。政治改革和文化教育的普及，《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季度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等著名杂志的推动，使得这个时期的中产阶级文化更加活跃，更加具有社会批判精神。此外，部分劳动阶级也加入了读者的行列，发出了来自底层的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与此同时，部分妇女也开始接受教育，她们也有更多的闲余时间看文章、写小说，开始实现18世纪末的女权主义者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期盼的理想：妇女们以同一种模式接受教育，逐渐成为有知识的公民，享受着自食其力、不依赖男人、独立自由的生活。¹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也就是所谓“民主化阅读时代”²的到来。

于是，在大众印刷传媒的推动下，英语散文进入了大众化和丰富多元的时代。在政治改革思想和个人自由主义观念的催生下，大众阅读市场迅速膨胀，报刊业和书市繁荣兴旺。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的英国社会，各类书刊已经飙升至五万余种。³这些出版物不仅刊登政治时论、宗教布道、社会问题评述、女性休闲等方面的文章，还热衷于发表小说连载和文艺评论等。这样大规模和多元的文化传播使得优秀的英语散文作品能够深入到更广泛的读者群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的英语散文大家，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 1839-1894)、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等人，都是当时的杂志编者或撰稿人。他们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观点在汇集成书之前就通过各类出版物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还有，以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为首的一批牛津学者更是以大量出版手册的形式，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牛津运动”，力图通过全社会范围内有关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价值和大学教育方向的辩论，重振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纽曼还对大学的教育做出反思，在强化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提倡人文通识教育，以此对抗机械和金钱的冷漠和单一，减缓商品与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和异化。

16
世纪前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1 沃斯通克拉夫特. 女权辩[M]. 谭洁, 黄晓红, 译.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5.

2 & 3 Mundhenk, Rosemary J., and LuAnn McCracken Fletcher, eds. *Victorian Pro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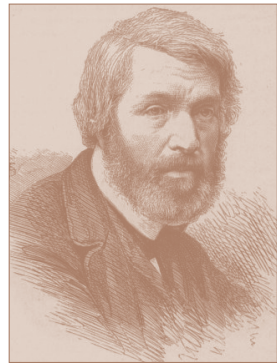


1.2 卡莱尔：社会预言家的文化诊断和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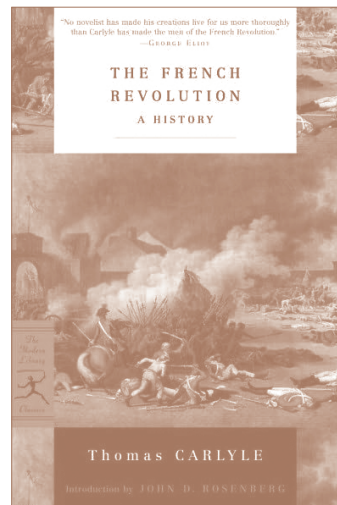
总体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化历史反思和艺术批评。这类散文著作意在复兴文化和张扬艺术之美，以此对抗工业化进程中机器和资本带来的信仰缺失、人性异化和道德沦丧。这一类英语散文写作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卡莱尔、马修·阿诺德、约翰·亨利·纽曼、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第二类是繁荣鼎盛的现实主义小说。查尔斯·狄更斯、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 1885-1930）等一大批杰出的小说家对现实社会进行细致的观察。他们的小说散文作品揭示了机器和金钱社会中的社会矛盾，展现了各阶层人物的欲望、焦虑和挣扎，为急剧转型中的社会注入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宿命的悲观主义情绪。第三类是以达尔文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践的话语。这一类的英语散文对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和社会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满了科学主义精神，也因其自然而个性的表达，在严谨的科学论述中加入了人文审美的色彩。

在上述第一类的散文作家中，卡莱尔在文坛出名最早，呼声最高，写出的文章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批评力度和醒世的预言家风格。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出生在苏格兰，14岁就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博览群书。后来，他又对德国哲学和诗歌深感兴趣，还翻译了歌德的小说，并与歌德保持书信联系，在思想上和写作风格上也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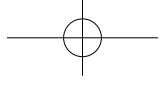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 托马斯·卡莱尔



● 《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

了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些影响。1834年，卡莱尔迁居伦敦切尔西，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几年之后，他出版了《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卡莱尔在这本书中展示的英语散文笔法具有十足的画面感。在他的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一连串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同一幕幕跌宕起伏的戏剧场面。这本饱含激情的历史著作显示出独



特的历史叙事风格，奠定了卡莱尔在伦敦文化圈里的声誉。

卡莱尔天生就有一种不盲从社会常规、敢于与其他思想争锋的性格。针对当时机械和金钱主宰社会的状况，他的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敏锐地直达问题的核心。在《时代的征候》（“Signs of the Times”）这篇 1829 年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中，卡莱尔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病症的诊断可谓切中脉络，一针见血：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英雄时代，不是虔诚时代，也不是哲思或道德的时代，而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机器时代”。⁴ 国家财富增加，但资本的剥削、劳动和工资的矛盾加剧，资本家的财富贪欲使劳动阶级陷入赤贫。与此同时，人变成了机器，以机器的模式塑造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人类自身的价值以及世界存在的合理性都遭到怀疑，成了被反复追问的对象。统治阶级对下层劳动阶级的贫困状况视而不见，继续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学“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致使无序竞争加剧，生产和分配脱节，工业生产过剩，人民衣不蔽体。对此，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1843）一书中这样描述：

当今世界，国富论、供求关系，诸如此类的喧嚣不绝于耳，对劳动和工资问题却全然不理睬。我们不愿说这个世界在倒退，我们宁愿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开足马力，匆匆前行，为的是把活儿干了，再生产，更多地生产。它无暇顾及工资的分配问题，却任凭强者的法律、供求关系法则、放任主义原则，以及其他无关痛痒的法则，或者那些不是法律的法律把这个问题弄得一团糟……你们那些机纺衬衫是用来干什么的？它们多达上百万件，挂在那儿卖不出去。而在这里，

数以百万计辛苦劳作、赤裸着脊背的人们却与之无缘。衬衫是用来为人体遮风挡雨的，否则它毫无用处，只能是一种莫大的嘲弄。

在这本书中，卡莱尔也用近乎呼喊的笔法，痛心疾首地描述了广大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

任何时候，那些数以百万计无声无息的劳苦大众生来就是辛劳的命。他们生活的希望被无数的痛苦遭遇、社会压迫和沉重的生活负担无情地抹去。他们根本没有娱乐，有的只是艰苦的工作，直至心力交瘁……人不是因为死亡而绝望，或者说不是因为会饿死而绝望。死的人多了！每个人都会死！……绝望是因为生活悲惨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因为筋疲力尽过后却一无所获，是因为心力衰竭却孤立无助，是因为被普遍存在的冷漠无情的“放任主义”法则死死缠住了。这样，人生就是慢慢死去的过程，就是被囚禁于无边压迫的监牢之中，就像被囚禁在西西里暴君法拉里斯那可憎的铜牛肚里。

这样的社会现象，卡莱尔称之为“英国状况”。其实，这何止是英国和那个时代的现象？这是整个西方工业化和自由市场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卡莱尔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否则将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不过，卡莱尔看不到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回望历史，试图在历史中找到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模板。因

4 <http://www.victorianweb.org/authors/carlyle/signs1.html>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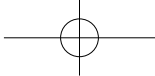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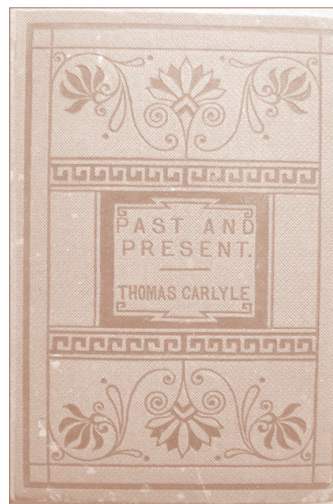


此，他的社会解决方案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回到历史上某个兴盛时代去寻找社会公平和道德的启示。他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能够幡然醒悟，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寄希望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沟通、协商和调整，希望找寻出一种新型的英雄崇拜，恢复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信仰，建立新的社会统筹力量。在《过去与现在》中，卡莱尔心目中的社会理想是通过杰出的历史人物引导社会重新定义民主和自由而实现，通过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即他所谓的“劳动骑士”）建立广泛的社会平等而实现。卡莱尔对此有独到的论述。在《过去与现在》的结尾部分，卡莱尔写道：“人类不可能互相隔绝地生存：我们就像同一肌体内的生命神经，为了相互的利益，或为了相互的苦难，大家互相绑在了一起。”在卡莱尔看来，这种温情的社会改良愿望也是英雄创造历史观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⁵ 马克思还指出：卡莱尔“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这样一来，他看到了劳动大众却不相信他们，他“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中都隐藏着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⁶

在英语散文史上，卡莱尔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焦虑和焦虑背后隐藏的理想主义、温情主义的改良思想，一直闪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语散文之中。

卡莱尔的英语散文风格也是独特的。写历



●《过去与现在》

史，他表现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宏阔，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叙事主线，描写细致，加入跳跃式、碎片化的历史想象，由此产生史诗般的视觉效果，读来竟有身临其境和忧心天下大势之感。这在《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该书中，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戏剧化语言，近乎逼真地展示出法国大革命中一些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就好像是一名记者在街头进行实地报道，让读者如身临其境，经历感官的冲击，在戏剧化的画面和喧嚣声中感受到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血腥和残酷，同时也预感到未来的社会大动荡。卡莱尔推崇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的精神，在声情并茂的细节描述、鲜明意象的叠加、生动的比喻以及心理刻画之外，字里行间透出对统治阶级的揶揄和嘲弄。请看巴士底狱被攻破后人们涌入城堡，群情激昂，暴力横行以及统治者震动惊恐的一幕：^①

另一方面，卡莱尔写评论也常常用词夸张，频繁使用首字母大写名词和最高级形容词，在演讲体的松弛句子结构中散发出充沛的情感，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⑤ & ⑥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① VIOLENCE AFTER THE STORMING OF BASTILLE
 攻占巴士底狱后的暴力革命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托马斯·卡莱尔

Why dwell on what follows? Hulin's *foi d'officier* should have been kept, but could not. The Swiss stand drawn up, disguised in white canvas smocks; the Invalides without disguise, their arms all piled against the wall. The first rush of victors, in ecstasy that the death-peril is passed, "leaps joyfully on their necks"; but new victors rush, and ever new, also in ecstasy not wholly of joy. As we said, it was a living deluge, plunging headlong; had not the Gardes Françaises, in their cool military way, "wheeled round with arms levelled", it would have plunged suicidally, by the hundred or the thousand, into the Bastille-ditch.

And so it goes plunging through court and corridor; billowing uncontrollable, firing from windows—on itself: in hot frenzy of triumph, of grief and vengeance for its slain. The poor Invalides will fare ill; one Swiss, running off in his white smock, is driven back, with a death-thrust. Let all prisoners be marched to the Townhall, to be judged!—Alas, already one poor Invalide has his right hand slashed off him; his maimed body dragged to the Place de Grève, and hanged there. This same right hand, it is said, turned back de Launay from the Powder-Magazine, and saved Paris.

De Launay, "discovered in gray frock with poppy-coloured riband", is for killing himself with the sword of his cane. He shall to the Hôtel-de-Ville; Hulin, Maillard and others escorting him; Elie marching foremost "with the capitulation-paper on his sword's point". Through roarings and cursings; through hustlings, clutchings, and at last through strokes! Your escort is hustled aside, felled down; Hulin sinks exhausted on a heap of stones. Miserable de Launay! He shall never enter the Hôtel-de-Ville: only his "bloody hair-queue, held up in a bloody hand"; that shall enter, for a sign. The bleeding trunk lies on the steps there; the head is off through the streets; ghastly, aloft on a pike.

Rigorous de Launay has died; crying out, "O friends, kill me fast!" Merciful de Losme must die; though Gratitude embraces him, in this fearful hour, and will die for him; it avails not. Brothers, your wrath is cruel! Your Place de Grève is become a Throat of the Tiger; full of mere fierce bellowings, and thirst of blood. One other officer is massacred; one other Invalide is hanged on the Lamp-iron: with difficulty, with generous perseverance, the Gardes Françaises will save the rest. Provost Flesselles, stricken long since with the paleness of death, must descend from his seat, "to be judged at the Palais Royal":—alas, to be shot dead, by an unknown hand, at the turning of the first street!—

...

In the Court, all is mystery, not without whisperings of terror; though ye dream of lemonade and epaulettes, ye foolish women! His Majesty, kept in happy ignorance, perhaps dreams of double-barrels and the Woods of Meudon. Late at night, the Duke de Liancourt, having official right of entrance, gains access to the Royal Apartments; unfolds, with earnest clearness, in his constitutional way, the Job's-news. "Mais," said poor Louis, "*c'est une révolte*, Why, that is a revolt!"—"Sire," answered Liancourt, "it is not a revolt, it is a revolut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1837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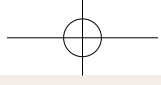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① VIOLENCE AFTER THE STORMING OF BASTILLE 攻占巴士底狱后的暴力革命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托马斯·卡莱尔

为什么还要接着说此后发生的事呢？于兰所说的“在场军官”担保攻城者不会伤害守城士兵的诺言本来应该予以遵守，但此刻没人理会这个诺言了。瑞士雇佣兵们都穿着白色的帆布罩衣，化装成拉选票的人员，围站在一起。守卫城堡的退役老兵们没有化装，他们的枪械都靠墙堆放。第一波攻城胜利者没有了被枪弹打死的威胁，兴奋之至，蜂拥而入，简直就是“直扑这些投降士兵的脖颈上”。兴奋的人潮一波接一波涌入，人声鼎沸，也不完全都是胜利的喜悦。可以说，那是一股活人组成的洪流，奔涌向前。法兰西禁卫军的士兵们则严守军纪，手拉手肩并肩组成人墙。如果不是他们的阻拦，这成百上千的人就会不顾性命危险，直接涌入巴士底狱外墙的护城沟壑之中。

这股人潮涌入城堡的深院廊道，似波浪翻滚，不可阻挡。人们从窗口射击，击中的却是自己人。到处响起胜利的欢呼、为死难者的悲号和复仇的怒吼。守卫队这些可怜的老兵这下惨了。有个穿着白罩衣的瑞士雇佣兵企图逃跑，被致命的一击逼了回来。所有的俘虏都要被押往市政厅受审。惨啊，一个守卫队老兵的右手被一刀砍了下来，他那残缺的尸体被拖到格雷沃广场悬挂示众。据说，正是这只右手，阻止了洛奈总督点燃军火库，使巴黎免遭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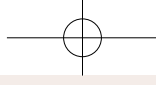
人们发现洛奈总督时，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长礼服，外佩一条深红色的绶带，正被逼迫用自己的杖剑自尽。后来，他由于兰、马亚尔等人护送，押往市政厅，一路上由埃利“持剑挑着投降书”走在前面开路！洛奈一路上遭到怒斥、诅咒、推搡、撕扯。最终，他还是被捅了刀子，护送人员被挤倒在一旁。于兰也筋疲力尽，倒在一堆乱石上。倒霉的洛奈啊！他到不了市政厅了，能进入大厅的只是他“血淋淋的手和手中握着的带血发辫”，这便算作是他到达那里的标志了。他那流血的尸身倒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头颅被砍下来，挑在枪刺上游街示众，很吓人。

严厉的洛奈总督死了，临死前高喊：“啊，朋友们，快快杀了我吧！”仁慈的洛斯麦也必须死，尽管有人对他心怀感激，在此危难时刻也愿意为他赴死，但这也救不了他。兄弟们，你们的愤怒多么残忍！你们的格雷沃广场此刻变成了血盆虎口，发出凶猛无比的咆哮，嗜血成性！又有一个军官被屠杀，又有一个守卫队老兵被吊死在铁灯柱上。法兰西禁卫军要克服多少困难，费尽多少周折，才能救下其余的人。巴黎市商务督察弗莱塞勒从一开始就一直身处死亡威胁的阴影中，此时也必须屈就起义者，走下座椅，“前往皇家宫殿接受审判”。可是，他竟然在第一条街道的拐弯处被无名的枪手击中身亡！

……

王宫中，你们这些愚蠢的贵妇啊，还梦想着你们的美酒华服呢！王宫中，一切都还是那么神秘兮兮的，但窃窃私语中也透出了恐惧！被蒙在鼓里的国王陛下还是那样无忧无虑，也许还在梦中想着他的双管猎枪和默东森林吧！这天深夜，特许出入王宫的利昂库尔公爵来到王室寝宫，以他那特有的汇报公事方式，忠实而又清晰地道出了他所获得的消息。“可是，”这位可怜的路易听罢说道，“这可是一场叛乱啊！”“陛下，”利昂库尔答道，“这不是叛乱，这是一场革命。”

译自《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1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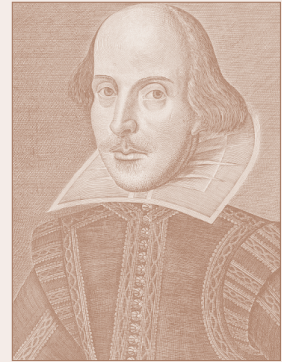
② SHAKESPEARE, WORSHIPPED AS OUR NATIONAL HERO
 莎士比亚：英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托马斯·卡莱尔

Whoever looks intelligently at this Shakespeare may recognise that he too was a Prophet, in his way; of an insight analogous to the Prophetic, though he took it up in another strain. Nature seemed to this man also divine; unspeakable, deep as Tophet, high as Heaven; "We are 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f!" That scroll in Westminster Abbey, which few read with understanding, is of the depth of any seer. But the man sang; did not preach, except musically...I cannot call this Shakespeare a "Sceptic", as some do; his indifference to the creeds and theological quarrels of his time misleading them. No: neither unpatriotic, though he says little about his Patriotism; nor sceptic, though he says little about his Faith. Such "indifference" was the fruit of his greatness withal: his whole heart was in his own grand sphere of worship (we may call it such); these other controversies, vitally important to other men, were not vital to him.

...

Well: this is our poor Warwickshire Peasant, who rose to be Manager of a Playhouse, so that he could live without begging; whom the Earl of Southampton cast some kind glances on; whom Sir Thomas Lucy, many thanks to him, was for sending to the Treadmill! We did not account him a god, like Odin, while he dwelt with us;—on which point there were much to be said. But I will say rather, or repeat: in spite of the sad state Hero-worship now lies in, consider what this Shakespeare has actually become among us. Which Englishman we ever made, in this land of ours, which million of Englishmen, would we not



give up rather than the Stratford Peasant? There is no regiment of highest Dignitaries that we would sell him for. He is the grandest thing we have yet done. For our honour among foreign nations, as an ornament to our English Household, what item is there that we would not surrender rather than him? Consider now, if they asked us, Will you give up your Indian Empire or your Shakespeare, you English; never have had any Indian Empire, or never have had any Shakespeare? Really it were a grave question. Official persons would answer doubtless in official language; but we, for our part too, should not we be forced to answer: Indian Empire, or no Indian Empire; we cannot do without Shakespeare! Indian Empire will go, at any rate, some day; but this Shakespeare does not go, he lasts forever with us; we cannot give up our Shakespear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1841

而突兀倒装，时而甚至直接呐喊，感性的力度十足。这些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思想感情冲击，让他们感受到预言家式的呼唤。例如，在1841年出版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中的英雄主义》(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一书中，他以充沛的热情和多变的文体神化了莎士比亚的文化地位：②

从以上文字来看，有学者说卡莱尔的行文天马行空、情感充沛，继承了浪漫主义散文的风格，展现了独特的文化批评力量，⁷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批判了卡莱尔的

7 Allott, Kenneth. Introduction. *Victorian Prose 1830-1880*. Ed. Kenneth and Miriam Allott.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56.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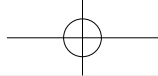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③ CHALMERS, A GREAT SCOTTISH PREACHER
查尔莫斯：杰出的苏格兰布道者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托马斯·卡莱尔

Chalmers was himself very beautiful to us during that hour, grave—not too grave—earnest, cordial face and figure very little altered, only the head had grown white, and in the eyes and features you could read something of a serene sadness, as if evening and starcrowned night were coming on, and the hot noises of the day growing unexpectedly insignificant to one. We had little thought this would be the last of Chalmers; but in a few weeks after he suddenly died...He was a man of much natural dignity, ingenuity, honesty, and kind affection, as well as sound intellect and imagination. A very eminent vivacity lay in him, which could rise to complete impetuosity (growing conviction, passionate eloquence, fiery play of heart and head) all in a kind of rustic type, one might say, though wonderfully true and tender. He had a burst of genuine fun too, I have heard, of the same honest but most plebeian broadly natural character; his laugh was a hearty low guffaw; and his tones in preaching would rise to the piercingly pathetic—no preacher ever went so into one's heart. He was a man essentially of little culture, of narrow sphere, all his life; such an intellect professing to be educated, and yet so ill *read*, so ignorant in all that lay beyond the horizon in place or in time, I have almost nowhere met with. A man capable of much soaking indolence, lazy brooding and do-nothingism, as the first stage of his life well indicated; a man thought to be timid almost to the verge of cowardice, yet capable of impetuous activity and blazing audacity, as his latter years showed.

I suppose there will never again be such a preacher in any Christian church.

Reminiscences, 1881

那一刻，查尔莫斯的形象在我们眼里十分美：面容庄重而不威严、诚恳而又和蔼，身材依旧如故，只是头上长满了白发。从他的眼睛和表情里，可以读到一种淡淡的哀伤，仿佛因为黄昏和星夜即将来临，喧闹热忱的白天不辞而别，逐渐淡去。我们没想到这是见查尔莫斯的最后一面。仅仅几周之后，他就突然故去……查尔莫斯自尊心强，为人诚恳而机敏，态度和蔼可亲，更兼具智慧和想象力。在他身上，这些品格都显得十分自然而然。查尔莫斯充满活力。他可以随兴而起，达到激情四射的忘我境地。不论是渐次加深的信念、澎湃的口才，还是尽兴抒发的感情或淋漓尽致的理性表达，都带有一种可以说是粗犷的风格，却又是那么真实和亲切。我听说，他还有一种豪爽风趣的性格，总是突然迸发。这也表现出他的率真，同时也更多地是出于他那平民化的本真性情。他笑则尽情大笑，低沉而有力；布道时声调激昂渐强，形成富有穿透力的感染效果，没有任何人的布道能够取得他那深入人心的效果。从根本上说，查尔莫斯的一生教养不深，阅历有限。他的心智在外部表现得很有学问，但却实在缺乏内在的读书功力，而且他对自己小天地之外的历史和世界也的确不甚了解。如此心智的人，我也是从未遇到过。他这个人，惯于沉浸在无所作为的闲适中，满足于慢条斯理的玄想和无为的信条，这从他第一阶段的人生中即可看出来。另一方面，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怕见生人、近乎胆怯的人，但从他的后半生来看，却也能够做出胆大妄为之举。

我觉得，基督教教会中如此的布道者应该是后无来者了。

译自《回忆录》(1881)

16
世纪前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1.3 穆勒、麦考利和弗劳德的散文：哲学和历史的简捷表述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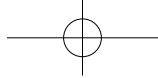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与卡莱尔同时代和之后的一些哲学、历史和文化批评散文家要比卡莱尔温和得多。他们的散文风格也要平易得多。尽管他们都显示出自己的写作个性，却都在传统和变化之间表现出一种所谓的“折中主义”（eclecticism）的散文风格，用英国学者肯尼思·阿洛特（Kenneth Allott）的话来说，就是“旧的‘中间文体’的废墟上重新繁荣的新的‘简明风格’”。这种风格“表现的是大城镇和城市的话语习惯，词汇更加丰富多样，句式更加多变，但总体上没有一点儿书卷气，结构也最为松散”。⁹ 这样的散文风格既表达出作者的主体性，也具有说理散文的客观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更新了的“中间文体”。这样的英语散文风格也是哲学思辨和历史叙事的简捷而又灵活的工具。在这方面，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散文风格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穆勒的父亲是英国的著名学者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詹姆斯·穆勒在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史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在苏格兰当过几年家庭教师。这个意志坚定的男人精力充沛，惜时如金，移居伦敦后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对子女的教育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是家中的长子，是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他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几乎每天都要接受父亲严格的古典语文训练：他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阅读了大量的古希腊历史和文学作品；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竟然还成了父亲的小助教，辅导他众多的弟弟妹妹一同学习。穆勒每天清晨随父亲到伦敦郊外晨练，汇报和交流学习所得和进程。这些

专注的学习经历使穆勒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遍读古典历史学、哲学和逻辑学。不到20岁他就成长为一位学者，在政治哲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宗教伦理和科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位知识广博而又思维缜密的学者，文学修辞不是他的喜好，象征比拟也不是他的强项。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历史、哲学和思维逻辑是主要的成分，他对诗歌和戏剧没有强烈的兴趣。穆勒在其自传中也提到，他的父亲对莎士比亚戏剧没有多大兴趣，对当时崇拜莎士比亚的风气嗤之以鼻。穆勒受其影响，英国诗歌读得很少。有一次，父亲为他朗读斯宾塞《仙后》中那些文采飞扬的诗句。对此，穆勒竟然兴趣索然。¹⁰

受到逻辑训练和抽象思维定式的影响，穆勒写起散文来，风格自然就与卡莱尔不同。他的论说散文很少调动情感，很少使用修辞格，也很少表现幽默。他擅长严谨的思想表述，使用“折中”的语言，论证中既穷尽细节，又尽量避免词句的重复，依靠逻辑的力量达到语义的明晰。这样一来，抽象的内容就可以表达得简洁轻快、通俗易懂。这些特点在他大量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和《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中，都有通篇的体现。（参见本书第17页节选文）不了解这些特点，就难以体会穆勒说理的透彻和逻辑的力度，翻译其作品就会指代不明，使思想变得支离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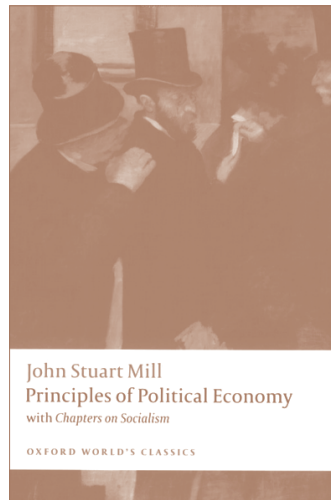
穆勒在他所有的思辨写作中都保持着这种逻辑分明、简洁有力的论说散文风格。这是基于他对理论知识和写作风格之间的关系的自觉认识。



●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 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



● 《政治经济学原理》

16
世纪前

16
世纪

他认为，从抽象的理论学习中锻炼出来的冷峻缜密的思维是形成简洁明快的散文风格的前提，但简洁有力的散文风格也会被知识和思想拖累，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他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因此，我从书本中直接获得的知识深深地刻在脑海……但是，对我来说，这样的知识再丰厚，也没有完全起到其作用。它只为我的写作能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穆勒以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为例说明问题。边沁早期的理论散文写得意义饱满、简明有力，读来轻快而豁达。而他后期的文章却写得拖沓沉重，为了思辨的准确和周全，往往在句子主干中加入层层从句，以致让阅读变成了费力费心的事。穆勒的散文写作风格曾受到边沁早期著作的影响，但是他逐渐“克服了早年的营养不良，筋骨上开始长出了肌肉，散文风格也就有了生机，步履轻快”。⁹这是穆勒少有的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比喻。

有必要提及的是，穆勒简练而又有理论力度的著作虽然深入人心，得到了读者的赞誉，但却并非没有强有力的反对者。例如，当时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学和政治学的权威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1829-1894）就写了《论自由、平等和博爱》（*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1873），对穆勒那本家喻户晓的《论自由》中的自由观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出身于知识分子世家的斯蒂芬大力倡导社会平等观念，对英国废除奴隶制起到了主导作用。他本人在伊顿公学、伦敦国王学院和剑桥三一学院接受过最严格的法学和政治学教育，著述十分广泛和深入。他深受霍布斯《利维坦》的影响，认为一切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起点都是对人性的研究，人类社会的人性欲望和利益冲突必须用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约束加以克服，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宁。在《论自由、平等和博爱》中，斯蒂芬抨击穆勒高扬人性自由的欲望，把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变成一种宗教式的原则。此外，斯蒂芬对穆勒的说理散文的理论逻辑也不以为然，认为《论自由》的观点和论断缺乏必要的例证。然而，理论和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斯蒂芬论战的语言却和穆勒的极为相似和同一。作为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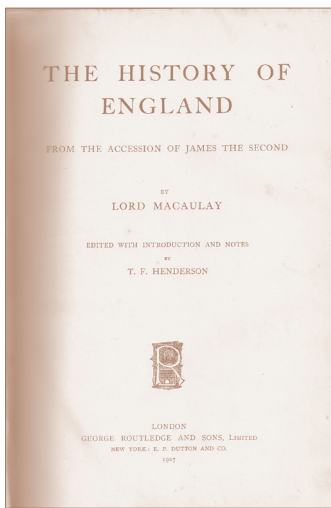
9 Allott, Kenneth. Introduction. *Victorian Prose 1830-1880*. Ed. Kenneth and Miriam Allott.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56.

10 & 11 Mill, John Stuart.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20
世纪



●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 《詹姆斯二世继位以来的英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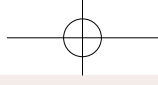
法学家的斯蒂芬思维缜密，逻辑强大，能用同样准确的词汇和简练的句式，对穆勒全书的论点逐一反驳，读来毫无理论的晦涩和书卷的沉重之感。（参见本书第 18 页节选文）

这种更新了的“中间文体”在历史散文中也不乏例子。例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以历史学家的精神，爬梳剔抉，细大不捐，积十五年之功写成的五卷本《詹姆斯二世继位以来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麦考利出身于贵族世家，天资聪颖，后来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大才子。他又是那个时代

公认的大演说家，为辉格党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改革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也为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的英文教育和法律体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麦考利的重要性还在于他的散文写作。从 25 岁开始，他一直为著名的《爱丁堡评论》撰文，文章写得生动有力，充满悖论和对比，既有演说家的气势，又有学者的风范。这些文章后来汇集在 1843 年出版的《批评和历史文集》（*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十分畅销。麦考利对穆勒的自由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持有异议。（参见本书第 19 页节选文）更为重要的是，麦考利于 1849 年在众目瞩目中出版了《詹姆斯二世继位以来的英国史》的前两卷，立刻引起轰动。麦考利的历史散文迎合城市中产阶级读者的阅读趣味，善于在开阔的历史叙事中，用一种艾迪生式的笔调侃侃而谈。他用词准确，语气诙谐，行文随叙事和议论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史实材料和主观评判交织一处，既写出了历史中政治文化的重大事件，也描绘出历史人物和平常的社会生活画面，其笔下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令人读来如临其境。此处举一例，即可见一斑。共和平等派的宣传鼓动家约翰·怀尔德曼（John Wildman）是政治风云中的不死鸟。他谋权善变，经历了内战、共和、王政复辟和光荣革命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屡遭危难却都能转危为安。麦考利是这样刻画这位政治幸运儿的：④

这里，麦考利的话语布局显得四平八稳，散文笔法却读来轻快流畅，寥寥数语交代了怀尔德曼的政治背景和行为后，聚焦此人在政治狂热中善于自保的机敏狡诈。其中，a wonderful skill in grazing the edge of treason 一语简洁而巧妙，让熟悉英国历史的读者即刻想到怀尔德曼几次以叛国罪入狱又能开脱罪名，逃脱死刑的经历。文中连用三个以 though 引导的排比，突出反映了此人政治上的执着和诡诈手段，同时



④ CUNNING MEN IN THE WHIRLWIND OF POLITICS
政治漩涡里的聪明人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Wildman had served forty years before in the parliamentary army, but had been more distinguished there as an agitator than as a soldier, and had early quitted the profession of arms for pursuits better suited to his temper. His hatred of monarchy had induced him to engage in a long series of conspiracies, first against the Protector, and then against the Stuarts.

But with Wildman's fanaticism was joined a tender care for his own safety. He had a wonderful skill in grazing the edge of treason. No man understood better how to instigate others to desperate enterprises by words which, when repeated to a jury, might seem innocent, or, at worst, ambiguous. Such was his cunning that, though always plotting, though always known to be plotting, and though long malignantly watched by a vindictive government, he eluded every danger, and died in his bed, after having seen two generations of his accomplices die on the gallows.

Danvers was a man of the same class, hotheaded, but fainthearted, constantly urged to the brink of danger by enthusiasm, and constantly stopped on that brink by cowardice. He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mong a portion of the Baptists, had written largely in defence of their peculiar opinions, and had drawn down on himself the severe censure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Puritans by attempting to palliate the crimes of Matthias and John of Leyden. It is probable that, had he possessed a little courage, he would have trodden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wretches whom he defended. He was, at this time, concealing himself from the officers of justice; for warrants were out against him on account of a grossly calumnious paper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had discovered him to be the author.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1849*

怀尔德曼四十*年前曾在议会军中服役,也干出点名气,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军功,而是因为他是出色的鼓动家。他早就放弃军职,干起了更适合自己的事情。他痛恨君主制,于是积极策划了一连串的颠覆活动,先是针对护国公克伦威尔,后来又把矛头指向斯图亚特王朝。

不过,怀尔德曼并没有被自己的政治狂热冲昏头脑,他也注意暗自保全自己。他常常与叛国罪擦边而过,手段非常高明。他善于巧言怂恿他人去干些掉脑袋的事,但这些话如果在陪审团里再说一遍,听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多也就是些模棱两可的闲言碎语。怀尔德曼深谙此道,简直无人能比。他总是在暗中策划这样那样的阴谋,人们也总是知道他在秘密策划着什么大事,恼怒的政府也长期派人对他进行怀有敌意的监视,但他总能逢凶化吉。多年来,他目送了两代同谋者一个个在绞架上气绝身死,自己却能够寿终正寝。

丹弗斯也是同一类人,头脑发热,但血性不足。他总是热血沸腾地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却又总是懦弱胆小,止步不前。他在一部分浸礼派分子中颇有影响,曾为他们那些古怪的想法写了不少辩护文章,也曾为马赛厄斯和莱顿的约翰开脱罪责而引火烧身,招来当时最显赫的清教徒的严词谴责。这个人如果稍稍有点血性,就完全可能步那些被他辩护的人的后尘,落得个可悲的下场。此时的丹弗斯,正在躲避执法人员的追捕;逮捕证已经签署,政府认为他写了一篇赤裸裸的诽谤文章。

译自《詹姆斯二世继位以来的英国史》
(1849)

* 考虑到本书选文部分的文学性,故译文部分的数字一般采用汉字形式。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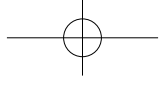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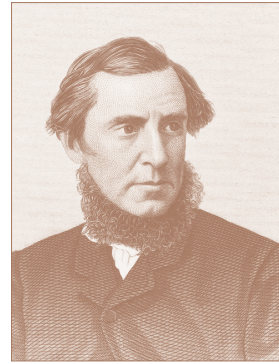
19
世纪

20
世纪



此人 died in his bed 和他的同谋们 died on the gallows 形成强烈对比，更加生动地突出了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怀尔德曼独特的政治经历。这样的历史叙事和人物描写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迎合了喜欢小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也是这部历史著作能够畅销一时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此细大不捐、文学意味强烈的历史书写，也免不了遭人诟病。比如，有的批评家认为他写得不够精练，注重历史场面的描绘和修辞效果多于对历史的冷静思考和分析，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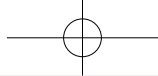
稍晚一点的另一位历史散文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也是如此。弗劳德深受卡莱尔的影响。他的《从沃尔西覆亡到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在历史叙事中表达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也在历史叙事中把历史人物和事件讲得有声有色。可以说，弗劳德为了阐明自己的历史观，用简明的语言勾勒出清晰的历史场景和事件，还带有些许文学叙事的色彩。但是，正如穆勒的简练散文风格背后是深厚的古典学支撑一样，弗劳德生动的历史画卷背后是大量的原始历史记录，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和专业功夫。弗劳德自幼喜爱荷马史诗，进入牛津大学后经过短暂的萎靡不振后发奋读书，特别喜欢读古希腊悲剧家的作品和品达的抒情诗，受到浓重的文学熏陶。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那里，弗劳德欣喜地发现，历史叙事中竟然蕴含着人类无穷的智慧！这样一个文学青年一旦着迷于历史，那么他书写的历史就必然带上了文学的韵味。不过，他的文字却又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考证基础上的生动的历史叙事。弗劳德写的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从大主教沃尔西的覆亡一直写到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历时半个多世纪。他对这段历史持有自己独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

到的看法，透过宗教意识形态的纷争现象看到了这场改革运动的现代意义：英国宗教改革是人类现代历史的转折点，是一场推翻教会权势的世俗化的运动。从这一立场出发，弗劳德认为，历史上的暴君亨利八世实际上是真正的爱国者和具有崇高抱负的伟大政治家。这不是纯粹的臆断。为此弗劳德充分占有史料，在历史典籍的细微处还原历史的真实。他几乎把生命中最宝贵的20年投入到对这段历史的追踪之中，期间从不满足于二手的材料，而是一直要追溯到历史人物留下的手稿。他为写这部历史而搜集研究的历史材料用9种语言写成，累计达九百多卷！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功夫。他带有文学色彩的历史叙事散文流淌自丰盈的源泉，却是真正的历史的表述。弗劳德这部历史著作共写了12卷。他把前几卷呈送给大学者卡莱尔，立即获得这样的赞誉：“这样的历史叙事，生动活泼，既充满阳光又沉稳平静，读来让人惊喜，可望对后续的历史做出简明扼要的说明。”¹²除了这部历史著作，弗劳德还写了近二十本不同时期的历史和人物传记，以及几本小说和诗歌，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其生动而又沉稳的文体。（参见本书第20页节选文）

12 Paul, Herbert W. *The Life of Froude*.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



⑤ WHAT IS THE LIBERTY OF THE INDIVIDUAL? 何为个人的自由?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But there is a sphere of action in which society,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dividual, has, if any, only an indirect interest; comprehending all that portion of a person's life and conduct which affects only himself, or if it also affects others, only with their free, voluntary, and undeceived consent and participation. When I say only himself, I mean directly, and in the first instance: for whatever affects himself, may affect others through himself; and the objection which may be grounded on this contingency, will receive consideration in the sequel. This, then, is the appropriate region of human liberty. It comprises, first, the inward domain of consciousness; demanding liberty of conscience, i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ense; liberty of thought and feeling; absolute freedom of opinion and sentiment on all subjects, practical or speculative, scientific, moral, or theological. The liberty of expressing and publishing opinions may seem to fall under a different principle, since it belongs to that part of the conduct of an individual which concerns other people; but, being almost of as much importance as the liberty of thought itself, and resting in great part on the same reasons, is practically inseparable from it. Secondly, the principle requires liberty of tastes and pursuits; of framing the plan of our life to suit our own character; of doing as we like, subject to such consequences as may follow: without impediment from our fellow creatures, so long as what we do does not harm them, even though they should think our conduct foolish, perverse, or wrong. Thirdly, from this liberty of each individual, follows the liberty, within the same limits, of combination among individuals; freedom to unite, for any purpose not involving harm to others: the persons combining being supposed to be of full age, and not forced or deceived.

No society in which these liberties are not, on the whole, respected, is free, whatever may be its form of government; and none is completely free in which they do not exist absolute and unqualified.

On Liberty, 1859

但是，也存在这样一个行为的范围。从社会的，即区别于个人的角度看，这样的行为即便和社会有利益关系，也只是间接的。这样的行为包括一个人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行为，且只对其个人本身有影响。或许，这样的行为也会影响其他人，但也是他人自觉自愿参与的，不是在被蒙骗的状况下同意和参与的。我说这样的行为只与个人有关，是说这是一种直接的、首先涉及他本人的行为。当然，不论何种行为，只要与个人本身相关，也就可能通过这个人而影响到其他人。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考虑对这种可能性的抵制了。可见，这种个人自身的行为正是人类的自由空间。首先，它应该包括内在的意识领域的自由，要有最广泛意义上的精神自由、思想自由、情感自由，以及对任何内容拥有个人看法和态度的绝对自由，无论是实践性的还是理论性的，也无论是科学的、道德的，还是神学方面的。发表或出版个人观点的自由可能又受制于另一种不同的原则，因为它属于涉及他人的个人行为。不过，这样的行为与思想自由本身同等重要，总体上也以同样的理性原则为基础，因此，在实践中与思想自由是分不开的。其次，人类的自由原则要求个人有追求自己志趣的自由，有按照个人特点制定生活计划的自由，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自由，条件是：这样做并不妨碍到我们的同类。尽管其他人会认为这样的个人行为是愚蠢的、不近情理的或荒谬的，只要这样做对他们不构成伤害，就应有这样做的自由。再次，在同样的限制范围内，我们不仅应有上述的个人自由，而且可以有个人之间联合的自由，也就是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联合行动的自由。当然，参与联合行动的人必须是成年人，而且未受到强迫或欺骗。

任何的社会，不论其政治体制如何，只要上述自由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那它就不是自由的社会。只要这样的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那这个社会就不是完全自由的社会。

译自《论自由》(1859)

16
世纪前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⑥ LIBERTY AND COERCION 自由与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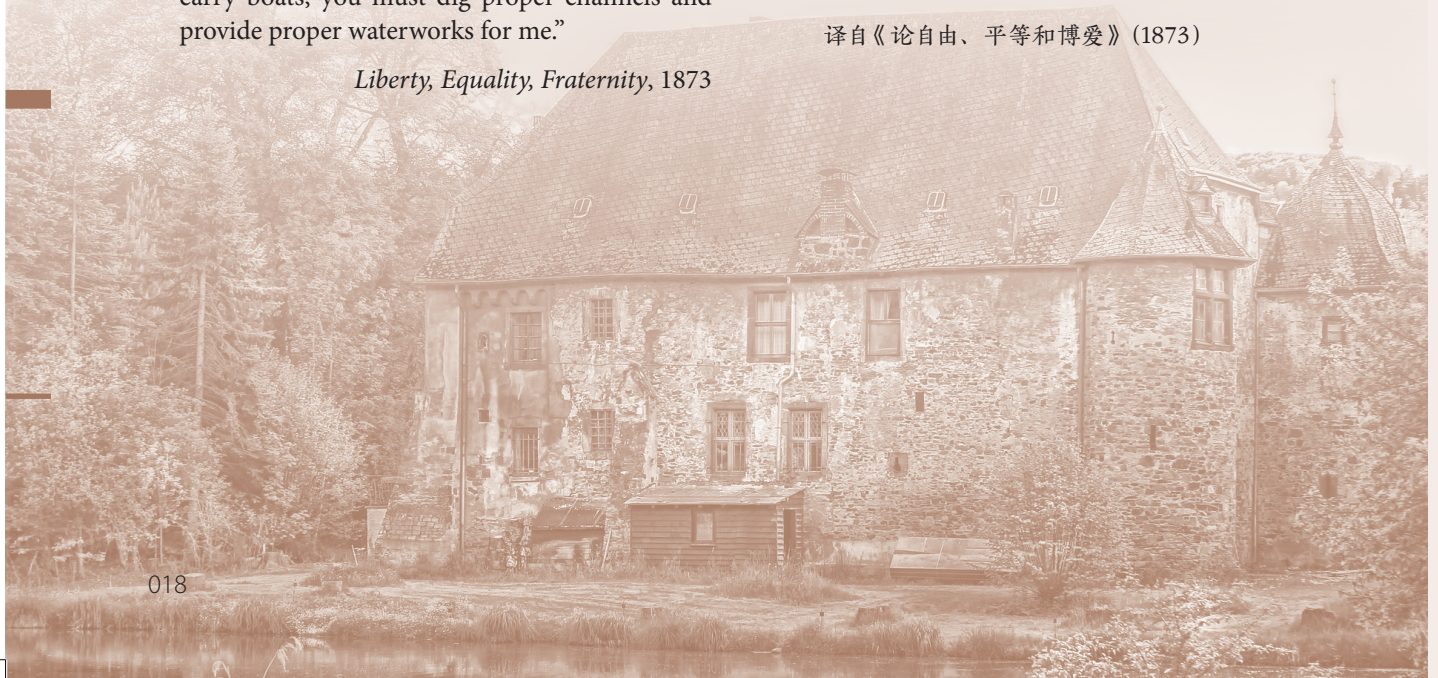
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1829-1894)
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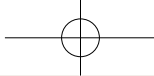
Men are so constructed that whatever theory as to goodness and badness we choose to adopt, there are and always will be in the world an enormous mass of bad and indifferent people—people who deliberately do all sorts of things which they ought not to do, and leave undone all sorts of things which they ought to do. Estimate the proportion of men and women who are selfish, sensual, frivolous, idle, absolutely commonplace and wrapped up in the smallest of petty routines, and consider how far the freest of free discussion is likely to improve them. The only way by which it is practically possible to act upon them at all is by compulsion or restraint. Whether it is worth while to apply to them both or either I do not now inquire; I confine myself to saying that the utmost conceivable liberty which could be bestowed upon them would not in the least degree tend to improve them. It would be as wise to say to the water of a stagnant marsh, “Why in the world do not you run into the sea? You are perfectly free. There is not a single hydraulic work within a mile of you. There are no pumps to suck you up, no defined channel down which you are compelled to run, no harsh banks and mounds to confine you to any particular course, no dams and no floodgates; and yet there you lie, putrefying and breeding fever, frogs, and gnats, just as if you were a mere slave!” The water might probably answer, if it knew how, “If you want me to turn mills and carry boats, you must dig proper channels and provide proper waterworks for me.”

人类已经被社会塑造成这样。无论我们采纳何种善恶理论，这个世界上都存在着，也将总是存在着数量巨大的恶人和冷漠之人。这些人故意去做那些他们本不该做的事，却绝不去做那些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权且估量，世间的男男女女有多少人自私自利，沉湎酒色，轻薄无礼，又有多少人碌碌无为，无所事事。再想想看，哪怕我们用尽最自由的讨论方式，又有多大可能让这些人改好呢？对这些人有实际作用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强制或限制。对待这些人，我们是否值得去同时或分别采用这两种手段，这个问题在此暂不讨论。我只想说，对于这些人，自由的程度即使发挥到想象的极致，也不会对他们的改造起到丝毫的作用。我们还不如对着一汪沼泽死水说：“你究竟为什么不流到大海里去？你完全自由啊。一英里以内没有任何的水利设备，没有水泵把你抽上来，没有固定的水渠逼你顺道流下去，也没有什么坚固的河床或堤坝把你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没有大坝也没有水闸。可是你却在这里躺着，在这里发臭，滋生热病，滋养蛤蟆和蚊虫，好像你就是个奴才！”这洼水如果会说话，也许会这么回答：“如果你想让我转动磨坊，载舟而行，那么你就必须为我挖出适当的水道，提供合适的水利设备呀。”

译自《论自由、平等和博爱》(1873)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1873





⑦ INDIVIDUALITY DOES NOT MEAN ECCENTRICITY
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求新怪癖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I went to the Athenaeum, and stayed there two hours to read John Mill on Liberty and on Reform. Much that is good in both. What he says about individuality in the treatise on Liberty is open, I think, to some criticism. What is meant by the complaint that there is no individuality now? Genius takes its own course, as it always did. Bolder invention was never known in science than in our time. The steam-ship, the steam-carriage, the electric telegraph, the gas lights, the new military engines, are instances. Geology is quite a new true science. Phrenology is quite a new false one. Whatever may be thought of the theology, the metaphysics, the political theories of our time, boldness and novelty is not what they want. Comtism, St Simonianism, Fourierism, are absurd enough, but surely they are not indications of a servile respect for usage and authority. Then the clairvoyance, the spirit-rapping, the table-turning, and all those other dotages and knaveries indicate rather a restless impatience of the beaten paths than a stupid determination to plod on in those paths. Our lighter literature, as far as I know it, is spasmodic and eccentric. Every writer seems to aim at doing something odd,—at defying all rules and canons of criticism. The metre must be queer; the diction queer. So great is the taste for oddity that men who have no recommendation but oddity hold a high place in vulgar estimation. I therefore do not like to see a man of Mill's excellent abilities recommending eccentricity as a thing almost good in itself...

Journal, 1859

我去了雅典娜名人俱乐部，在那待了两个钟头，拜读了约翰·穆勒论自由和论改革的书。两本书里说的大都不错。不过我觉得他在《论自由》里关于个人主义的评论还是有些可以商榷的地方。穆勒抱怨说当今没有个人主义，他到底是指什么呢？天才自有其套路，从古到今，历来如此。大胆的发明创造从来都有，只不过不像当今的科学那样引人注目。蒸汽动力船、蒸汽汽车、电报、燃气灯和新的武器装备，这些都是例子。地质学是一门相当新的真科学，颅相学却是一门相当新的伪科学。对于当今的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理论，不论人们怎么看，都不会缺少大胆和创新。孔德主义、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说起来够荒唐的了，但是这些主义绝不意味着对实用和权威的毕恭毕敬。再说那些洞见深刻、惊世骇俗和令人拍案叫绝的新论，诸如此类的所有老朽和无赖之见，它们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傻乎乎地决意在前人踩出来的老路上艰难前行，不如说是对这些被反复踩踏的老路的躁动不安和不耐烦。据我所知，我们当今那些大众文学也不安分，推崇标新立异。似乎每个作者都要写点出格的东西，以示对所有文学批评规则和套路的藐视。他们的诗歌，音律一定要怪，用词一定要异。人们如此热衷于追求怪异品味，以至于那些没有任何人推荐，只有怪异想法的作家竟然在大众读者心目中地位甚高。说来说去，我是不愿看到穆勒如此完美的大才，却把纯粹求新的怪癖几乎当作好东西向读者推荐……

译自麦考利的日记(1859)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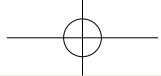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⑧ NEWMAN AT OXFORD
牛津的纽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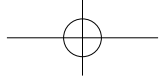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

It has been said that men of letters are either much less or much greater than their writings. Cleverness and the skilful use of other people's thoughts produce works which take us in till we see the authors, and then we are disenchanted. A man of genius, on the other hand, is a spring in which there is always more behind than flows from it. The painting or the poem is but a part of him inadequately realized, and his nature expresses itself, with equal or fuller completeness, in his life, his conversation, and personal presence. This was eminently true of Newman. Greatly as his poetry had struck me, he was himself all that the poetry was, and something far beyond. I had then never seen so impressive a person. I met him now and then in private; I attended his church and heard him preach Sunday after Sunday; he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insidious, to have led his disciples on to conclusions to which he designed to bring them, while his purpose was carefully veiled. He was, on the contrary, the most transparent of men. He told us what he believed to be true. No one who has ever risen to any great height in this world refuses to move till he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He is impelled in each step which he takes by a force within himself. He satisfies himself only that the step is a right one, and he leaves the rest to Providence. Newman's mind was world-wide. He was interested in everything which was going on in science, in politics, in literature. Nothing was too large for him, nothing too trivial, if it threw light upon the central question, what man really was, and what was his destiny. He was careless about his personal prospects. He had no ambition to make a career, or to rise to rank and power. Still less had pleasure any seductions for him. His natural temperament was bright and light; his senses, even the commonest, were exceptionally delicate. I was told that, though he rarely drank wine, he was trusted to choose the vintages for the college cellar. He could admire enthusiastically any greatness of action and character, however remote the sphere of it from his own. Gurwood's *Dispatches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came out just then. Newman had been reading the book, and a friend asked him what he thought of it. "Think?" he said, "it makes one burn to have been a soldier." But his own subject was the absorbing interest with him.

"The Oxford Counter-Reformation", *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 Fourth Series*, 1883

有人说过，大凡文人，不是人不如其文，就是人胜于其文。这些文人将他人的思想用得聪明，用得巧妙，固然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让我们这些读者五体投地，不过有朝一日见到作者本人，才觉得原来不过如此。天才之人则不然，其如水之源，泉水长流而其源不竭。对于天赋之才，绘画和诗歌不过是雕虫小技，略展其能而已。在他的生活常态、言谈举止和个人仪态中，天然才情无不得到恰如其分或更为充分的表达。以此评判纽曼，再准确不过了。他的诗歌已经足以让我深受震撼，但是他本人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甚至是远远超越了诗歌本身。他是我平生见过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我时常在私下遇到他，每个礼拜都到教堂听他的布道。都说他是一个不露声色的人，目的明确而深藏不露，在不知不觉中就引导自己的信徒得出他预先设定的结论。其实正相反，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坦诚的人了。他一旦认准某事为真，即直言相告。在这个世界上，大凡有大成就者，在尚未弄清何去何从之前都不会轻举妄动，而且每走一步都会听从内心的驱动。只有步子走对了，方能获得内心的满足，而最终成功与否则听天由命。纽曼有放眼世界的心智。他的兴趣涵盖了当今的科学、政治学、文学的方方面面。人类到底是什么？人类的归宿又是什么？这是纽曼关注的中心问题。任何话题，只要对理解这个中心问题有所启迪，在纽曼看来就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对于个人前途之明暗，纽曼从来不在意。他既无大志成就功名，也无意高就权位。各种诱惑于他，更是无机可乘。他天性机智，活泼轻快。他的感觉格外敏锐，即便是最寻常的感知，亦如此。我曾听说，他很少饮酒，却受到学院的信任，委托他为学院的酒窖选购藏酒。不管什么大事件，无论什么大人物，纽曼都能够满怀激情地赞美之，尽管这些事情与他自己的专业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那时，古尔伍德写的《威灵顿公爵征战记》一书刚刚出版。一次，纽曼正读此书，一个朋友问他对此书有何想法。“想法？”纽曼答道，“想到那时能当个军人，真是满腔的热血啊。”当然，纽曼对于自己专业的研究，更是全力以赴。

译自《重大问题之简析》（第四辑）中的文章
《牛津的反宗教改革》（1883）



1.4 阿诺德的文化批评散文：倡导“美感和智慧”的文化救世呼声



● 马修·阿诺德

与历史散文家不同的是，文化批评家要更贴近现实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们的散文中时常强烈地表达出作者对社会的针砭以及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意图。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就是英国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

西方文化批评界历来对阿诺德评价很高。20世纪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左派文化叛逆年代中坚守西方人文道统，提倡读“伟大的书”。他为阿诺德作传，称他是“西方的现实主义大师之一”，并说阿诺德的文化重建工程就是要“对人类的秩序、和平和大同充满理想，希冀以此理想在人类社会造就真正的人”。¹³ 这一理想就是阿诺德意图引导人类坚守人文信仰，重铸伦理道德意识，克服现实生活中的苟且、浅薄和渺小，走向内心“美感和智慧”（sweetness and light）的“文化救世”的理想。这一理想也为20世纪初以美国文学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提供了思想渊源。

马修·阿诺德出身于教育改革家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教育救世”思想的影响。

他也曾去湖区度假，成为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邻居和朋友，感受到诗人是如何用浪漫主义诗歌的美抵制工业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侵蚀。受此影响，阿诺德后来写了大量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歌，力图通过诗歌审美的崇高境界，滋养心灵，拯救世界，重建人的精神信仰和完美的文化价值。1844年，阿诺德以普通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但他却饱读群书，特别是德国哲学和文学，还特别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在牛津期间，他读过卡莱尔的文化批评论著，也深受约翰·亨利·纽曼为首的“牛津运动”的影响。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文化批评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1851年，阿诺德开始担任教育巡视员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这项工作。他在全国范围内巡视检查教学工作，为政府的教育部门撰写教育状况的调查报告，有时一年之内就到过近三百所学校，接触了近五百名教师和两万名学生。在此过程中，阿诺德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工业化、世俗现实化时代的精神危机，更加意识到“文化救世”的重要，也更加坚信必须坚守人文道德精神，追求知识和真理，追寻内心的崇高和美，以此对抗维多利亚时代工业技术和物质文化对人的腐蚀和异化。同时，他也愈发意识到，必须让诗歌，让文学承担起政治改良、文化批评、社会道德和文化教育的任务。

1853年起，阿诺德转向文化批评。三十多年间，他以简明而充满智慧的散文语言写了大量的著述，内容涉及社会文化、文学和宗教等各个领域。阿诺德曾明确指出：“诗歌说到底就是一

13 Trilling, Lionel.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39.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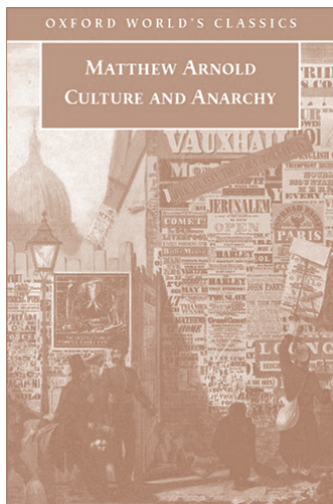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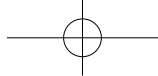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文化与无政府主义》

种对生活的评判。”他认为，诗歌表达了人类社会最完美的东西，并且教导人类走向完美的存在境界。（参见本书第25页节选文）他提出：“无功利地努力学习和传播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好的文化和思想”，¹⁴是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精神品质。在他的散文著述中，阿诺德力图培养人们的这种文化品味和批判的精神，消除维多利亚时代产生的新贵族和中产阶级的等级观念和虚荣，抵制中产阶级物质至上的庸俗和浅薄以及“群氓”的低俗和麻木。他号召读者建立完整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意识，通过学习世界历史上全部的优秀思想文化，克服英国狭隘的岛国意识和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从而获得一种文化上的普适的、完美的、有道德深度的文化美感和精神信仰，即获得一种他所谓的“美感和智慧”的体验。在其《文化与无政府主义》(Culture and Anarchy)和两卷本的《评论集》(Essays in Criticism)中，阿诺德痛感启蒙主义以来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摧残，蔑视权贵阶层的空虚和中产阶级的无知，劝导人们追求文化的智慧和精神的完美：⑨

这种主观意图强烈、诚恳而又乐观的笔触，清晰地表达了他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救世思想，显示了一种近乎新的文化“乌托邦”的理想。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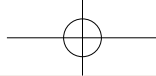
论这一理想是否能够在现代阶级社会和国家体制范围内实现，阿诺德在一个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里对人类文化的美学反思和社会憧憬，就足以使他的思想成为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源泉。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延绵不断，也对当今的人们反思科技主义主导的数字网络时代有着启发意义。

就散文风格而言，阿诺德的文章表现了作者的睿智和对社会的细致观察，申明了作者的文化救世观点。在他的文章中，清雅如话的行文层层推进，反复强调的口吻和强势的讽刺，都意在说服读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论人们如何反对，我的写作风格就是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而且收到效果。”¹⁵但总体来说，阿诺德的行文趋于居高临下，谆谆的教诲有时显得宽泛和宏阔，表现出他所倡导的诗歌写作中的“高雅品格”(Grand Style)，即古典作家，如荷马、维吉尔以及弥尔顿等人的风格。这可能与他生在教师家庭，多年的教师生涯养成了好为人师的性格和行文习惯有关。阿诺德对此也是自觉的。他承认自己的写作风格是“柯林斯式”(Corinthian Style)的，即一种主编评论式的，光彩逼人却缺乏温情，急促而不安详，有效而不安静。总之，其特点就是没有灵魂，一切为了达到目的，立论为了驳倒对手，为了胜利后的掌声。¹⁶这样的散文风格，多少带有点教诲和学究的气息，还需要语言艺术的滋养。

14 Arnold, Matthew. *Essays in Criticism: Second Series*. London: Macmillan Ltd., 1915.

15 Russell, George W. E., ed. *Letters of Matthew Arnold 1848-1888*. New York: Macmillan, 1895.

16 Jump, J. D. *Matthew Arnold*. London: Longmans, 1955.



⑨ SWEETNESS, LIGHT, AND THE SOCIAL IDEA
美感、智慧和社会理念

MATTHEW ARNOLD
(1822-1888)
马修·阿诺德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n, is the pursuit of sweetness and light. He who works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works to make reason and the will of God prevail. He who works for machinery, he who works for hatred, works only for confusion. Culture looks beyond machinery, culture hates hatred;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 the passion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It has one even yet greater!—the passion for making them *prevail*. It is not satisfied till we *all* come to a perfect man; it knows that the sweetness and light of the few must be imperfect until the raw and unkindled masses of humanity are touched with sweetness and light. If I have not shrunk from saying that 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so neither have I shrunk from saying that we must have a broad basis, must have sweetness and light for as many as possible. Again and again I have insisted how those are the happy moments of humanity, how those are the marking epochs of a people's life, how those are the flowering time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ll the creative power of genius, when there is a *national* glow of life and thought, when the whole of society is in the fullest measure permeated by thought, sensible to beauty, intelligent and alive. Only it must be *real* thought and *real* beauty; *real* sweetness and *real* light. Plenty of people will try to give the masses, as they call them, an intellectual food prepared and adapted in the way they think proper for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masses. The ordinary popular literature is an example of this way of working on the masses. Plenty of people will try to indoctrinate the masses with the set of ideas and judgments constituting the creed of their own profession or party. Our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give an example of this way of working on the masses. I condemn neither way; but culture works differently. It does not try to teach down to the level of inferior classes; it does not try to win them for this or that sect of its own, with ready-made judgments and watchwords. It seeks to do away with classes; to make 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known in the world current everywhere; to make all men live in an atmosphere of sweetness and light, where they may use ideas, as it uses them itself, freely,—nourished, and not bound by them.

This is the *social idea*; and the men of culture are the true apostles of equality. The great men of culture are those who have had a passion for diffusing, for making prevail, for carrying from one end of society to the other, the best knowledge, the best ideas of their time; who have laboured to divest knowledge of all that was harsh, uncouth, difficult, abstract, professional, exclusive; to humanise it, to make it efficient outside the clique of the cultivated and learned, yet still remaining the *best* knowledge and thought of the time...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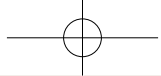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9 SWEETNESS, LIGHT, AND THE SOCIAL IDEA
美感、智慧和社会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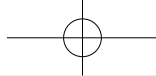
MATTHEW ARNOLD
(1822-1888)
马修·阿诺德

所以说，追求完美即追求美感和智慧。致力于美感和智慧者，即上帝理性精神和神旨之弘扬者。致力于机械手段者、为仇恨而工作者，即混乱之制造者。文化之旨趣，远在机械手段之上。文化憎恶仇恨。文化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热情，即追求美感和智慧的激情。文化的目标甚至更为宏远，即普及美感和智慧，使之深入人心。直到普天下的大众全部成为完美之人，此文化才会心满意足。文化之意也十分明确：少数人的美感和智慧并不完美，只有那些未开化的粗俗大众心中也点燃了美感和智慧之光，完美的文化方能实现。我们必须致力于美感和智慧，我说这话可谓坚定不移。我也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为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广泛的基础，必须尽可能在更多的人心中培育美感和智慧。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举国上下都闪耀着生命和思想的活力，全社会每个角落都浸透着思想，每个人对美都有敏锐的感悟力，人们充满智慧和活力，那么，这将是人类的幸福时光、一个民族的了不起的时代、文学艺术和所有天才创造的繁荣昌盛的时期。当然，这必须是真正的思想、真正的美，也就是真正的美感和智慧。有不少人试图为他们所谓的大众群体提供精神食粮，但是他们所能给予的，只是经过他们加工的，他们自以为适合大众现实状况的东西。当今的大众文学正是这样作用于大众群体的。很多人都站在自己的专业或政党的立场上，试图用他们既定的思想和判断来对大众进行说教。众多宗教组织和政治团体的作为就是此类大众工作的一个例子。我并不批判这两种方式，但是文化的运作方式不是这样的。文化不迎合下层阶级的需要而谆谆教诲，文化也不试图用某某社会阶层现成的思想和名言警句来赢得下层大众。文化力图抹平阶级界限，让这个世界产生过的最好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让所有人都生活在美感和智慧的文化氛围中，让他们像文化一样，能自由地运用思想——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思想的束缚。

这就是我倡导的社会理念。具有文化素养的人都应该是平等主义的忠实倡导者。文化大家应该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热情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和普及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知识和理念；他们努力摆脱所有粗制滥造、晦涩难懂、专业生僻的知识；他们以人文精神改造知识，使之在精英雅士的小圈子之外发挥功效，同时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

译自《文化与无政府主义》(1869)





10 CRITICISM OF LIFE
生活的评判

MATTHEW ARNOLD
(1822-1888)
马修·阿诺德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to hold fast to this: that poetry is at bottom a criticism of life; that the greatness of a poet lies in his powerful and beautiful application of ideas to life,—to the question: How to live. Morals are often treated in a narrow and false fashion; they are bound up with systems of thought and belief which have had their day; they are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pedants and professional dealers; they grow tiresome to some of us. We find attraction, at times, even in a poetry of revolt against them; in a poetry which might take for its motto Omar Khayyam's words: "Let us make up in the tavern for the time which we have wasted in the mosque." Or we find attractions in a poetry indifferent to them; in a poetry where the contents may be what they will, but where the form is studied and exquisite. We delude ourselves in either case; and the best cure for our delusion is to let our minds rest upon that great and inexhaustible word *life*, until we learn to enter into its meaning. A poetry of revolt against moral ideas is a poetry of revolt against *life*; a poetry of indifference towards moral ideas is a poetry of indifference towards *life*.

"Wordsworth", *Essays in Criticism*, 1888

因此，重要的是坚定地相信这一点：诗歌说到底就是一种对生活的评判。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以有力而优雅的方式为生活注入思想，说明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对于道德问题，我们的态度往往是偏狭的、错误的。我们总是把道德问题与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这些并非永恒的东西相提并论。于是，道德沦为学究和专业人员手中的玩物，逐渐让一些人感到厌烦。有时，我们甚至在那些反叛道德的诗中获得快感。有的诗可能把奥马尔·海亚姆的话“清真寺里虚度的光阴，应该在酒馆里得到补偿”奉为座右铭。但是我们有时却会被这样的诗所吸引。有些诗歌尽管形式考究，精雕细刻，但对道德却冷眼旁观，其内容放任随意，满不在乎。对于这样的诗，我们也会兴趣盎然。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在把自己引入歧途。要想回到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们静心于“生活”这个意义无穷的词语，久之方可领悟它的真谛。反叛道德观念的诗就是反叛生活本身的诗。对道德观念漠不关心的诗就是对生活本身不屑一顾的诗。

译自《评论集》中的文章《华兹华斯》(1888)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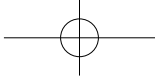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1.5 “两个国度”里的社会责任感：罗斯金和莫里斯的艺术评论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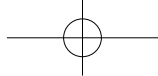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 约翰·罗斯金

在那个工业主义至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冒头的时代，工具理性横行，政治焦虑和民主改革加深，社会分化和贫富差别加剧。对此，明智的政治家们看得清楚，写起文章来也明白如话，能够洞察出社会分化后的基本矛盾和人们的精神贫困和危机。

杰出的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迪斯累里热爱文学，又学习法律和经济，后来成为英国保守党改革派的领袖。他看到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直不赞同功利主义，反对辉格党主张的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的经济政策持批判的态度。他曾两度出任首相，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他主张对外扩张，巧取豪夺，促成了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开疆拓土，殖民霸权。除了治国理政的领袖才能外，迪斯累里写起小说来也是行家。他的政治小说《科宁斯比：年轻的一代》（*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1844）和《西比尔：两个国度》（*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这种生活与资本家的金钱社会形成鲜明

的对比。由此迪斯累里醒目地提出：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个国度”。“两个国度”的说法，准确而又形象，成为当时的经典表述。

那个工业文明“进步”时代造成的“两个国度”的社会矛盾太突出，太剧烈，就连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这样热爱艺术的散文评论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罗斯金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在父母望子成龙般的期待下，饱读诗书，后来又在牛津大学学习诗歌艺术。他一直在父母的注视下成长，对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此时尚未向唯美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的视野也没有离开过他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罗斯金对艺术改变世界的力量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他的社会责任感最终让他转向对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走向一种实践美学的体验。罗斯金对人类成为机械装置的现实表示悲哀，指出艺术应该具有社会道德功用，于是他的艺术评论便载负了文化道德的成分。与同时代的一些艺术评论家相比，罗斯金的不同在于：在一个机械和金钱当道、物质主义的功利社会里，他转而发掘人的审美意识，自觉地彰显艺术的美，反衬出机器工业和金钱社会中唯利是图的竞争和弥漫于社会的铜臭。他坚信，真正的艺术应该出自道德高尚、思想敏锐、有崇高精神追求的人。而且，通过普及艺术审美，可望改造社会，回归人文精神。40岁以后，罗斯金开始为一些杂志写稿，内容涉及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论题，同时他对艺术评论也保持同样的关注。1870年，罗斯金成为牛津大学的艺术学教授。在牛津，他支持拉斐尔前派（the Pre-Raphaelites），投身艺术教育和社会活动，力图把对艺术和社会的思考转变成一种社会实践。



⑪ MOUNTAIN PURPLES 山的紫色

JOHN RUSKIN
(1819-1900)
约翰·罗斯金

Consider, first, the difference produced in the whole tone of landscape colou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purple, violet, and deep ultramarine blue, which we owe to mountains. In an ordinary lowland landscape we have the blue of the sky; the green of grass, which I will suppose (and this is an unnecessary concession to the lowlands) entirely fresh and bright; the green of trees; and certain elements of purple, far more rich and beautiful than we generally should think, in their bark and shadows (bare hedges and thickets, or tops of trees, in subdued afternoon sunshine, are nearly perfect purple, and of an exquisite tone), as well as in ploughed fields, and dark ground in general. But among mountains, in addition to all this, large unbroken spaces of pure violet and purple are introduced in their distances; and even near, by films of cloud passing over the darkness of ravines or forests, blues are produced of the most subtle tenderness; these azures and purples passing into rose-colour of otherwise wholly unattainable delicacy among the upper summits, the blue of the sky being at the same time purer and deeper than in the plains. Nay, in some sense a person who has never seen the rose-colour of the rays of dawn crossing a blue mountain twelve or fifteen miles away, can hardly be said to know what tenderness in colour means at all; bright tenderness he may, indeed, see in the sky or in a flower, but this grave tenderness of the far-away hill-purples he cannot conceive.

Modern Painters, 1856

在一幅风景画中，加入一些紫红色、紫罗兰色和深蓝色这些用于表现山的颜色，想想这幅画的总体色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一幅常规的低地风景画中（当然也不一定限于低地），我们会看到天的蓝色、草的绿色。这些颜色都会让我觉得十分清新而鲜艳。还有，树丛的绿色、树干和阴影中透出的些许紫色成分，这些都比我们一般想到的色调更为丰富，也更美。午后柔和的阳光中，光秃秃的篱笆、灌木丛和树丛的顶部形成的树色和阴影，都显出近乎完美的紫色，形成一种细腻精致的色调。那些翻耕过的土地和深色大地中的枝干树影，色调同样丰富而美丽。但是在表现群山的绘画中，除了上述这一切，在群山远景中不间断地涂抹出整块的纯紫罗兰色和纯紫色，甚至在近景，在深色的山谷或树林上方加上几笔最为轻曼柔和的淡蓝色，像淡淡的云雾飘过。这些淡青色和紫色逐渐过渡到上方的群峰中的玫瑰色调，显得如此精巧微妙。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同时，天空的蔚蓝色会比原野上天空的色调显得更纯净，更深邃。这么说吧，倘若一个人从未见过清晨时分玫瑰色的光线穿过十二或十五英里以外的蓝色山峰，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人就几乎不可能懂得什么叫作色彩中的柔性。没错儿，他可能见过天空中或花朵中那种“鲜艳”的色彩柔性，但他绝对想象不出用以表现远处群山的这种紫色所表达出的肃穆的柔和。

译自《现代画家》(1856)

罗斯金的艺术评论和政治经济论文十分丰富，一生写了百余本书和册子。他对艺术的理解建立在对艺术品全方位的“细读”之上，建立在主体内心的美感体验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艺术评论散文写得自然而精彩，而且十分细腻。他在诗意的行文中用词特别精致准确，表现了对艺术独到的理解和对艺术品的细节的观察。在他的《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

《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中，读者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素朴的美的节奏、色调匀称的画面感，还有和谐的诗意：⑪

拉斐尔前派的创始人之一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曾这样评论罗斯金：“那是一种诗意盎然的散文风格……任何人只要读过他写的3页文字，就一定会发现，正如福斯特评说柯尔律治的那样，英语的全部词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对英语词汇的记忆犹如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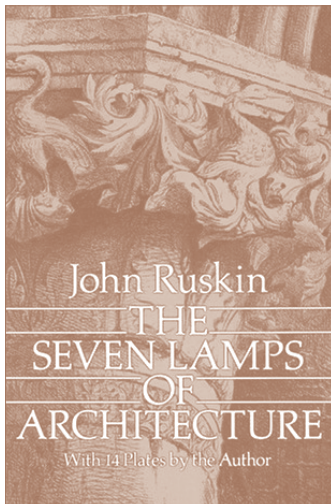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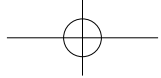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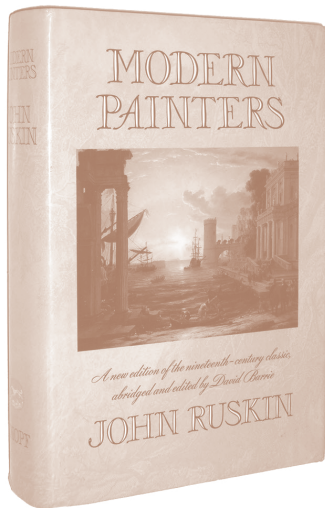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建筑的七盏明灯》



●《现代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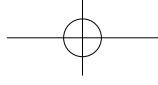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他对美的感受那样，既广博又自然。”¹⁷ 不仅如此，罗斯金的行文中常带有古典文化的诗意和典故，还有一种《圣经》的简洁文风和朴素美。这种风格具有拉斐尔前派的特点。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对此说得很好：“罗斯金的散文就像在阳光中开放了英语中所有的喷泉。”¹⁸ 这样充满纯真诗意的朴素风格，来源于罗斯金内心对直觉本能的美的渴望，也是一种经历过人生风霜后回归纯真的愿望。罗斯金在晚年写的自传体散文集《往事》（*Praeterita*）中就集中流露了这种“只有年轻人才可能体验到的美感”。在书中的“往日思景钩沉”一节中，罗斯金这样回忆他 18 岁那年跟随父母旅行，到达约克郡北部的卡特里克大桥（Catterick Bridge）远眺时的感受：

那时我 18 岁，最后一次感受到对大自然那种孩子般纯真的爱，那是华兹华斯轻松挥洒出来的永生之恋……清泉在卵石上潺潺流过，东西两面山丘绵延，让人想起约克郡谷底的荒原和山谷。我身临其间，这种感觉忽又归至，仿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么强烈。¹⁹

这样的诗意纯真是罗斯金心底的守望，也是他散文的底色。罗斯金的心中一直有着这样的乡愁和艺术冲动，所以无论他的社会道德责任感有多么强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多大的关注，他都注定不可能成为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社会批判也注定只是一个具有强烈唯美主义倾向的艺术家道德和艺术的投枪，难于在“两个国度”冲突的社会现实中掀起大的波澜。

与罗斯金同时代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也是艺术家和散文作家，也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也试图在社会的现实中找到一种动手创造美的方式（书封设计和装饰艺术等），来抵消或对抗机械崇拜和金钱关系对人的异化。与罗斯金不同的是，他的审美选择是社会的、激进的，也更是实践的。

威廉·莫里斯从小就善于在大自然的美中发现自我内心的审美激情，所以自然对罗斯金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评论散文情有独钟。他在牛津大学期间又受到拉斐尔前派回归古典美、自然美和装饰美画风的熏陶，还读过托马斯·卡莱尔的文化批评。在这样的审美和文化的影响下，莫里斯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实践。他在伦敦建造了著名的“红房子”（Red House），从外观设计到内



●威廉·莫里斯



●莫里斯的“红房子”

16
世纪前

16
世纪

部艺术装饰，都回归中世纪艺术的简朴和自然。他 also 以此艺术风格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工艺美术设计界成名。

莫里斯这位声如洪钟、不修边幅的工艺设计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机器和金钱霸权，对唯利是图的自由主义商业竞争感到深深地失望。后来，他接触到马克思的思想，认识到艺术根植于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之中，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堕落已经使艺术变得功利和颓废，必须加以拯救。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中少有的社会主义者。不过，莫里斯的社会解决方案也是美学的。他力图使诗、艺术和社会融为一体，简化艺术形式和审美，让更多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美的存在。在莫里斯的美学实践中，他试图用人自主自为的工艺美术设计革新来对抗机器生产和金钱交易对人的异化，让机械生活中日益工具化的人重新获得美的享受。另一方面，他坚信只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才能重铸劳动的价值和美，因此他力图让人们认识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而且也是重新找到美的有效途径。这样的主张在他的《艺术与社会主义》(Art and Socialism) 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后来他又写了《约翰·保尔之梦》(A

Dream of John Ball) 和《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手工艺劳动美的向往。莫里斯是艺术家、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也是宣传家、社会主义活动家，因此他的散文语言简朴自然，写作风格贴近生活，简洁的行文中也蕴藏着奔放的激情，甚至是直抒胸臆的呼喊，表达了一个不平则鸣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参见本书第 30 页节选文)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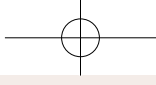


17 Bradley, J. L., ed. *John Ruskin: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18 Alexander, Michael.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19 Morley, Frank. *Literary Britain: A Reader's Guide to Its Writers and Landmark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0.

20
世纪



12 CRY FOR SOCIAL EQUALITY
呼唤平等的社会

WILLIAM MORRIS
(1834-1896)
威廉·莫里斯

To say ugly words again. Do we not *know*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in civilised societies are dirty, ignorant, brutal—or at best, anxious about the next week's subsistence—that they are in short *poor*? And we know, when we think of it, that this is unfair.

It is an old story of men who have become rich by dishonest and tyrannical means, spending in terror of the future their ill-gotten gains liberally and in charity as 'tis called: nor are such people praised; in the old tales 'tis thought that the devil gets them after all. An old story—but I say "*De te fabula*"—*of thee* is the story told: *thou art the man!*

I say that we of the rich and well-to-do classes are daily doing in likewise: unconsciously, or half consciously it may be, we gather wealth by trading on the hard necessity of our fellows, and then we give dribblets of it away to those of them who in one way or other cry out loudest to us. Our poor laws, our hospitals, our charities, organised and unorganised, are but tubs thrown to the whale; blackmail paid to lame-foot justice, that she may not hobble after us too fast.

When will the time come when honest and clear-seeing men will grow sick of all this chaos of waste, this robbing of Peter to pay Paul,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Commercial war? When shall we band together to replace the system whose motto is "The devil take the hindmost" with a system whose motto shall be really and without qualification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Who knows but the time may be at hand, but that we now living may see the beginning of that end which shall extinguish luxury and poverty? Whe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shall have melted into one class, living contentedly a simple and happy life.

Art and Socialism, 1884

再说几句难听的话。难道我们不知道，文明社会里的大多数人肮脏，无知，又粗鲁？说好听点，他们只关心下个礼拜是不是还有吃的。一句话，这些人是“穷人”。只要我们想一想就会知道：这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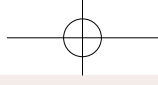
从古至今，人们都说：富人靠巧取豪夺发家致富；富人为防不测而花费不义之财，美其名曰：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不过，这些人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古语说，这些人最终将被魔鬼捉了去。这是古老故事的说法，不过要我说，这故事说的就是你！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再再说一遍，我们这些有钱人和富有阶层的人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我们靠榨取那些迫于生计的人们的劳动而积聚财富，然后拿出其中极少的份额分给他们中间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鼓噪，声音叫得最响的人。我们的那些个贫民法、类似济贫收容院的机构以及慈善机构，不论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都是转移视线的权宜之计，都是付给跛脚法律的保护费，目的就是别让那跛脚法律跟我们跟得太紧。

混乱无序、消耗浪费、抢了彼得的钱来偿还保罗的账，这就是商业竞争的法则。诚实的人，睿智的明白人，你们何时才能对此感到厌憎呢？我们何时才能团结起来，建立一个信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实而又平等的社会体系，来取代这个信奉“落后的人该死”的社会体系？

谁知道呢？这个时代也许就在眼前，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许看到了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它终将抹平奢侈和贫穷，让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统统融为一体，过着简朴满足而又欢乐幸福的生活。

译自《艺术与社会主义》(1884)



13 THE ABSTRACT ELEMENT IN ART
艺术的抽象元素

JOHN RUSKIN
(1819-1900)
约翰·罗斯金

We are to remember,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colours and lines is an art analogous to the composition of music, and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facts. Good colour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vey the image of anything but itself. It consists in certain proportions and arrangements of rays of light, but not in likenesses to anything. A few touches of certain greys and purples laid by a master's hand on white paper will be good colouring; as more touches are added beside them, we may find out that they were intended to represent a dove's neck, and we may praise, as the drawing advances, the perfect imitation of the dove's neck. But the good colouring does not consist in that imitation, but in the abstract qualities and relations of the grey and purple.

In like manner, as soon as a great sculptor begins to shape his work out of the block, we shall see that its lines are nobly arranged, and of noble character. We may not have the slightest idea for what the forms are intended, whether they are of man or beast, of vegetation or drapery. Their likeness to anything does not affect their nobleness. They are magnificent forms, and that is all we need care to know of them, in order to say whether the workman is a good or bad sculptor.

The Stones of Venice, 1853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色彩和线条的排列组合与音乐作曲是同一个道理，它们都不必照搬客观存在。用得好的色彩只须表现其自身，不必表现其他事物的形象。好的色彩以一定的比例和排列形式聚合了光线，但并不一定要“像”什么事物。一个绘画大师用灰色和紫色在白纸上挥洒几笔，这就构成了好的色彩。如果他在旁边又添上几笔，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他意图表现的是一只鸽子的脖子。随着这幅画逐渐成形，我们可能会赞叹说这是对鸽子脖颈的完美模仿。然而，好的色彩并不是这种模仿，而是表现了灰色和紫色这两种颜色的抽象色质及其相互关系。

与此相似，雕塑大师一旦选定模块，开始造型，我们可以看到雕刻线条排列得雄浑而高雅，整个造型显示出高贵的气质。至于这些线条意欲何物，是人还是动物，是植物还是帘布，我们可能一无所知。这些线条是否“像”什么并不影响它们自身的高贵气质。我们知晓这些雄伟的线条即可，以此便可判断一位雕塑家的优劣。

译自《威尼斯之石》(1853)

16
世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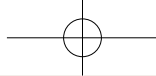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14 A LOCOMOTIVE AND THE HANDS OF AN ARTIST JOHN RUSKIN
火车头和艺术家的手 (1819-1900)
约翰·罗斯金

I cannot express the amazed awe, the crushed humility, with which I sometimes watch a locomotive take its breath at a railway station, and think what work there is in its bars and wheels, and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must be who dig brown iron-stone out of the ground, and forge it into THAT! What assemblage of accurate and mighty faculties in them; more than fleshly power over melting crag and coiling fire, fettered, and finessed at last into the precision of watchmaking; Titanian hammer-strokes beating, out of lava, these glittering cylinders and timely-respondent valves, and fine ribbed rods, which touch each other as a serpent writhes, in noiseless gliding, and omnipotence of grasp; infinitely complex anatomy of active steel, compared with which the skeleton of a living creature would seem, to a careless observer, clumsy and vile—a mere morbid secretion and phosphorous prop of flesh! What would the men who thought out this—who beat it out, who touched it into its polished calm of power, who set it to its appointed task, and triumphantly saw it fulfil this task to the utmost of their will—feel or think about this weak hand of mine, timidly leading a little strain of watercolour, which I cannot manage, into an imperfect shadow of something else—mere failure in every motion, and endless disappointment; what, I repeat, would these Iron-dominant Genii think of me? And what ought I to think of them?

The Cestus of Aglaia, 1865

有时，我站在火车站，注视着喘着粗气的火车头，那种五体投地、无地自容的感觉真是难于言表。我在想，火车头内那些连杆棒棒和轮轮圈圈到底在干些什么样的活儿！那些制造火车头的人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才能从地底下挖出铁矿石，然后把它们打造成这样！这些东西组装在一起，竟然有这么精准和强大的功能！只有超出肉体的力量，才能最终把岩浆和火舌巧妙地铸成这般模样，其精确度与钟表堪有一比。人们用巨大的铁锤敲打火山岩，锻造出这些闪闪发光的汽缸和准确开合的阀门，还有这些排列整齐的连杆。它们步调一致，通力前行，犹如一条蜿蜒爬行的蛇，悄然无声过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解剖开来看，这是一堆充满动力的钢铁，其构造极为复杂而有序。相比之下，一个活物的骨架乍看起来是如此地粗鄙、糟糕，不过就是些病态的分泌物和支撑着肉身的磷化物！人们想到制造火车头这个点子，于是把它锻造出来，点燃了它那有条不紊、默默做工的动力，自豪地看着它完美地按照人们的意图完成工作。这些人看到我这只柔弱的手该做何想呢？这只手小心翼翼地牵引着一缕水彩颜料，不知所终，到头来呈现出某种并不完美的模糊物象。在他们看来，这过程中每一个动作纯粹都是失败，都是一连串看不到头的失望。我再说一遍：这些满脑袋钢铁的天才们怎么看我呢？我又该怎样看他们？

译自《智美女神阿格拉娅的饰带》(1865)